

國際戰爭衝突中的檔案命運

The Fate of Archives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劉志偉 Liu, Zhi-Wei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博士生

PhD. Student,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薛理桂 Hsueh, Li-Kuei

國立政治大學文學院圖書資訊與檔案學研究所名譽教授

Emeritus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brary Information and Archival Studies,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摘要

檔案是一個國家重要的歷史紀錄和關鍵文檔。細數國際間的戰爭衝突，檔案無不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本文透過梳理過去戰爭衝突中檔案之作用與價值，檔案管理相關之國際條約，以及戰後檔案爭端的管理實踐，反映國際戰爭衝突中顛沛流離的檔案命運，並欲藉此引發檔案工作者在特殊情形尤其在武裝衝突狀況下對檔案保護的思考，以及維護檔案主權的信念。

Abstract

Archives are important historical records and key documents of a country. Archive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international wars and conflicts. This paper, by analyzing the conflict in the role and value of archives, archives management of the relevant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d management practice of the disputed archives after the war, reflecting the drift from place to place of archives' fate in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is to arouse the archivists' thinking on the protection of archives in special situations, especially in the case of armed conflict, and their faith in safeguarding the sovereignty of archives.

關 鍵 字 | 戰爭衝突、檔案管理、條約

Keywords | conflict of war, archives management, the treaty

檔案是「保證民主及其長久的武器庫」
（McKemmish & Upward, 1993）。

—— Terry Eastwood

壹、前言

西元（以下同）2020 年 1 月 3 日凌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國際機場附近遭到美國空襲。在這次襲擊中，伊拉克人民動員組織領導人阿布·邁赫迪·穆罕迪斯（Abu Mahdi al-Muhandis）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領導人凱西姆·蘇萊馬尼（Qasem Soleimani）身亡（VERGUN, 2020）。這一行為將原本就處於顛簸震盪中的美伊關係，再次推至懸崖邊。隨著衝突事件的不斷發酵，美國甚至喊話伊朗，稱或襲擊伊朗的文化遺產。這是 2020 年開年後的首個備受全球矚目的重大國際事件。美國是否真的襲擊伊朗的文化遺產或未可知，但仔細盤點歷次戰爭衝突，文化遺產似乎都成了無法逃脫的「受害者」，而其中作為具有特殊歷史記憶價值的文獻遺產——檔案，也難逃劫難。

2003 年 3 月，伊拉克戰爭爆發。首都巴格達淪陷後，復興黨緊急派人進入伊拉克國家檔案館並銷毀了「1963 年以來有關復興黨歷史」的檔案（Eskander, 2004），以防止入侵部隊獲取有關伊拉克國家機密檔案，造成國家與民眾陷入危險。而美國檔案人員學會（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SAA）則將此事件認定為「薩達姆政權在蓄意破壞壓迫檔案紀錄，隱藏以往的犯罪證據」。SAA 認為這些檔案是屬於伊拉克人民的文化遺產，失去這種遺產不僅會傷害伊拉克人民，而且對世界人民來說都是一種損失，並敦促伊拉克在未來重建期間要將保護文獻遺產作為優先事項（Cox, 2011）。儘管如此，伊拉克的檔案文獻，依然逃不過被「代管」的命運。最終，在整個伊拉克戰爭期間，美軍從不同渠道

獲取並沒收了約 4 萬 8,000 盒有關伊拉克國家、政府日常運作以及與國家歷史有關的檔案，並被保存在卡塔爾（Qatar）的美國軍事倉庫中，另外 700 萬頁文件被存入史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美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美國國防部（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以及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SAA, 2003）。戰爭結束後，SAA 與加拿大檔案人員學會（Association of Canadian Archivists, ACA）曾於 2008 年聯合發佈聲明，要求美國政府應遵循國際公約的精神，盡快向伊拉克合法政府歸還伊拉克檔案，以尊重伊拉克政府和人民的利益（ACA, 2008）。伊拉克方面對此也曾多次要求美國當局歸還戰亂期間流向該國的重要文物和檔案（Hmud, 2011; Kami, 2010）。儘管美國政府表示認同，但檔案歸還之路障礙重重，歸還日期一再推遲，至今尚未取得任何實質進展（Caswell, 2011; Kahana, 2018）。上述事件，只是 20 世紀以來數十場戰爭中的一次。事實上戰爭從未停止，而那些失敗國的國家檔案，也隨著戰爭消失或顛沛流離。

本文主要透過梳理當前國際社會對戰爭衝突中的檔案管理條約及實踐過程，反映國家檔案在國際衝突過程中的艱難命運，從而為爭議檔案的索取和歸還提供參考，同時也為特殊時期尤其是戰爭衝突期間制定符合需要的檔案管理規範提供思考。

貳、國際戰爭衝突中檔案的特殊地位與價值

現代戰爭的衝突，除了是各種先進、尖端科技的武器裝備的比拼外，檔案更是無法忽視的「軟武器」，無論是在戰前、戰時、戰後，都發揮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和價值。

早在 1960 年代，當時科威特宣稱獨立時，伊拉克即對其提出收復領土之要求，而作為科威特的保護國英國則擔心伊拉克會伺機進攻科威特，從而引起中東地區的動盪。因此，英國軍方當時就立刻制定了將伊拉克軍隊逐出科威特的軍事預案，並在預案中詳盡的分析了當時伊拉克的軍事實力及武器裝備情況，同時研究了英國部隊攻擊伊拉克和科威特境內的軍事目標的具體細節。儘管後來，伊拉克暫時未對科威特採取軍事行動，但這份文件作為檔案完好的存入了檔案館。1990 年海灣戰爭爆發，英國參謀部隨即調出這份檔案，根據現代的狀況，快速的為英軍制定了新的作戰計畫。而同英軍相比，美國國防部在此前也曾制定了一份同伊拉克假想作戰計畫，並記載了實施計畫時軍隊集結的方法、調遣的線路、戰術的運用等諸多值得參考的內容。然而，美方參謀人員在調閱該檔案時，卻苦苦查詢不到該檔案下落。後經調查發現，原因為美國曾出於自身利益的需要，在一段時間裡採取扶持伊拉克的政策，導致假想作戰計畫被視為無用計畫，所以在檔案庫中被抹掉，原稿也被銷毀。最終導致美軍參謀人員不得不重新趕擬了新的「沙漠盾牌」作戰計畫，但在一定程度上已延誤了時間（舒道，1992）。

不僅如此，檔案在戰時對交戰雙方同樣意義重大。儘管有學者認為，檔案應與藝術品、文物等文化財產一樣受到《國際法》保護，不可被佔有或繳獲（孫志偉，2018）。不過仔細思考就會發現，對於某些只具有文化或歷史意義的檔案來說，該觀點是有效的，然而對於國家或政府檔案來說，情況就複雜的多。這類檔案可能是某種文化財產，但在戰爭中對於衝突雙方而言，極具軍事和情報價值。美軍《反叛亂手冊》中，就強調收集敵方檔案的重要作用，「透過分析歷史文獻和文件紀錄，查找和確定地方成員關係，並了解部落、家庭、組織、政府等特徵及其紐帶」（Army,

2014）。Ernst Posner（1944）也提到「對於政治家來說，敵人的檔案是決勝的秘方，其中就包含了如秘密政策、資源和行政命令等重要資訊」。因此，獲得這些檔案對於交戰雙方都非常必要，特別是外國辦事處的檔案最為迫切。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以及 1983 年格瑞那達戰役期間，美軍就曾多次接到上級通知，要求無論在任何場所，地面部隊應積極搜集並託管繳獲的檔案，以用於「重要的、專門的開發」。

除此之外，檔案還對戰區的行政管理起到重要作用，能夠幫助戰後快速恢復秩序、重建法制。特別是政權更替期間，人口、房產等檔案對戰後公民生活的穩定，合法財產的保護，財產歸屬認定提供了重要依據（NSDD, 1983）。2006 年，美國海軍的一份報告中還曾強調對伊拉克檔案的研究，能夠成為指控敵方犯罪的有力證據（OIF, 2006）。

鑒於檔案的特殊性，政府檔案在戰爭衝突中一直處於艱難的境地。其爭議的焦點在於，誰可以合法擁有檔案的管理權？一方面，被侵犯國誓死捍衛主權文化，保障人民不受侵犯；另一方面，侵略國試圖繳獲一切，以保證戰爭中的絕對優勢。也因此，如何判定戰爭中檔案的合理地位變得困難重重。

參、國際戰爭衝突中檔案管理條約及其局限

儘管眾多專家、學者就是否應將檔案與文化財產等同視之，觀點不一，但國際上為解決檔案歸屬權爭端，通常以簽訂條約的形式來規範處理有關檔案的問題。歷來關於戰時檔案命運的爭論總體來看，都離不開「檔案不可分割」原則，而這一原則體現在一系列國際條約中（詳見附錄）。在以往及現行的國際條約中，已有較多國際性條約中明確提到有關戰爭衝突過程中檔案管

理的法律約束。同樣，也有少數相關條約雖未明確出現檔案一詞，但多以文件、紀錄、文獻等字眼出現，但由於缺乏明確的界定，當面對檔案爭端時，在適用性和實用性上大打折扣，易造成各國對條文的解讀和認知無法統一。

國際上與檔案概念相關的締約最早可追溯至 1648 年簽訂的《西發里亞和約》，該和約的簽訂標誌著基於西發里亞主權概念的現代國際體系的開始，確立了國家主權、國家領土與國家獨立等原則，並逐漸流行成為國際法和世界秩序的中心原則。和約中含蓄的規定了「一旦戰爭結束，在敵對行動中被奪取或流離失所的檔案應當歸還」及「佔領軍事單位的檔案為佔領國財產」（ICA, 1995）。

1919 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美、英、法、日、義等與會國簽訂了《協約及參戰各國對德和約》即《凡爾賽條約》。該條約中規定了關於德國領土、海外殖民地、軍隊及賠款等 400 項條文。與領土主權相適應的，條約中規定德國必須把屬於主權領土的檔案文件移交給各有關國家。其中，《凡爾賽條約》第 38 條規定：「德國政府應將移轉於比國主權下之領土內屬於民政、軍政、財政、司法或其各項之檔案、登記冊、地圖、證券及文件立即移交比國政府。德國政府亦應將戰爭期間內德國官吏在比國公共行政機關攜去之各種檔案文件交還比國政府」。作為《凡爾賽條約》的補充，此後簽訂的《聖日耳曼條約》、《納伊條約》、《特里阿農條約》、《洛桑條約》等均對戰爭衝突期間的檔案管理作了規範。其中《聖日耳曼條約》第 191 條規定：「奧地利應將侵佔地內所掠奪之一切紀錄、文件、古物與美術品及科學與目錄學之各種資料，凡屬於國家或省縣或慈善宗教各公所或其他公私機關者，均應分別還於協約及參戰國」。《納伊條約》第 126 條規定：「保加利亞保證毫不遲延地搜尋和返還在戰爭期間

從希臘、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 - 克羅地亞 - 斯洛文尼亞國的領土內劫去的具有考古、歷史或藝術價值的一切文件、檔案或一切物品分別交給上述各國」。《特里阿農條約》第 177 條規定：「匈牙利應以公共機關所有之紀錄、文件及歷史資料，凡與割讓領土有直接關係而於 1868 年以後被攜去者，分別交還於有關係之協約及參戰各政府」。《洛桑條約》第 139 條規定：「有關土耳其政府的民政、司法或財政機關或土地管理當局的檔案、登記簿、圖、據和一切性質的其他文件應彼此予以移交」（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1961）。

1921 年，俄羅斯與波蘭簽訂停戰協議後，雙方簽訂《波蘭與俄羅斯和烏克蘭和平條約》即《里加和約》。其中第 11 條第 5 款規定：「俄羅斯和烏克蘭應將 1772 年 1 月 1 日起至 1918 年 11 月 9 日止這一期間即俄羅斯管理波蘭共和國領土期間內屬於立法機關以及一切部、軍隊、行政機關、自治團體和公私組織的中央、省級和地方機構的檔案、登記簿、檔案清單、契證、文件、地圖、圖案和草圖等，凡與現在波蘭共和國的領土有關，並且事實上在俄羅斯和烏克蘭領土內者，一概返還波蘭。如在波蘭境內存在著對仍歸俄羅斯或烏克蘭的領土有特別利益的本款所述物件，波蘭承允在同樣條件下將此項物件返還俄羅斯和烏克蘭」。

1945 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了建立新的國際和平秩序，各國之間同樣簽訂了一系列條約，其中涉及檔案處理問題的主要有兩個，《對義大利和約》及《對匈牙利和約》。其中《對義大利和約》第 12 條第 1 款規定：「義大利應將 1918 年 11 月 4 日與 1924 年 3 月 2 日間，自南斯拉夫地區內移去的一切美術、歷史、科學、教育、宗教性質的物品（包括一切契證、手稿、文件及圖書資料）連同行政檔案（卷宗、登記表冊、繪圖及各種文件）交還南斯拉夫」；第 25

條規定：「義大利同意取消從中間政府取得義大利天津租界所根據的租借權，並將該租界市政府內各種財產及檔案移交中國政府」；第 37 條規定：「義大利應將 1935 年 10 月 3 日以後，自埃塞俄比亞移往義大利的埃塞俄比亞及其國民的美術品、宗教或有歷史價值的物品以及檔案在本條約生效後 18 月內歸還」。在《對匈牙利和約》中，則主要通過劃定匈牙利與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的領土疆界，規定了檔案的隸屬。條約中第 11 條規定：「匈牙利應將原屬於南斯拉夫或捷克斯洛伐克的完整的歷史檔案，人民所有的圖書、歷史文件、古物和其他文物，以及藝術家、作家或科學家所創作的藝術、文學和科學原作等予以歸還」（竇曉光，1999）。

上述條約的出現，不僅印證了檔案與國家及領土主權的重要關聯，也反映出檔案與人民生活、社會日常運作的緊密關係。儘管從內容上看，不同條約均規範了戰爭衝突後檔案的歸屬以及移交方式，但從條約的簽訂性質來看，仍屬於締約國之間的內部條約。換言之，這些條約中的對於檔案乃至文化財產的管理規範，仍無法適用至國際範圍，並且這些條約的作用時間，也主要在戰後的檔案歸還及恢復階段，無法避免檔案等文化財產遭受戰火的危害。

基於此，為保證對圖書、藝術作品及歷史和科學文物等世界文化遺產的保存與維護，1954 年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與協調下，由前蘇聯、美國和英國等 50 個國家聯合在海牙簽署了《關於發生武裝衝突時保護文化財產的公約》，亦被稱為《海牙公約（1954 年）》，為國際社會保護武裝衝突中的文化財產提供了重要依據。該公約第 4 條規定：「締約各方應尊重在其自己領土內的以及在其他締約各方領土內的文化財產；不得採取針對文化財產的任何敵對行為，禁止對文化財產以任何形式實施的盜竊、搶劫或侵佔以及任何破壞行為；不得徵用在締約另

一方領土內可以移動的文化財產；不得對文化財產實施任何報復行為等」（霍政欣，2016），而公約中所提及的文化財產，就涵蓋了建築、藝術、歷史紀念物、考古遺址、手稿、書籍、科學收藏品、檔案或者上述財產的複製品。1970 年，再次通過《巴黎公約》，「承認各國政府有保護屬於本國的國家檔案的權利，禁止除原主權國主管當局發放出口許可證之外的文化財產運出本國領土」，並強調「主權國家要求索回或歸還流失的文化財產，是其正當的權益。若政權變更，凡繼承國和被繼承國任何一方要求複製對方的國家檔案，另一方應予提供，且費用由提出國負擔；凡國家檔案的繼承，引起被繼承國對檔案權利的消失和繼承國對檔案權利的產生，不應視為對保全國家檔案全宗的完整有任何問題」。1983 年，聯合國第 38 屆大會通過《關於國家對國家財產、檔案和債務繼承的維也納公約》，進一步完善了有關檔案的處理問題。公約規定：「凡有關領土或疆界擁有權的國家檔案，應轉屬於繼承國；凡涉及領土的正常行政管理的這部分國家檔案，應留在該領土內轉屬於新獨立的國家」。

國際公約的簽訂，反映了各國對國家檔案的保護、歸屬和繼承問題有著強烈的敏感性，也讓國際社會對戰爭衝突中檔案的管理原則達成了廣泛的共識。但這種共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締約國對公約的理解程度以及是否能夠完全履行公約的影響。如在 1954 年《海牙公約》第 4 條第 2 款中，則提到「在軍事必要絕對需要的情況下，方得予以摒棄」，同樣，在第 11 條第 2 款中規定：「只有在無可避免的軍事必要的非常情況下，方得撤回豁免」。儘管後者對「軍事必要」的情況進行了進一步限制，但整個條約並未明確就「軍事必要」、「無可避免」、「非常情況」等情形作具體的闡述和界定。換言之，1954 年《海牙公約》在某種程度上為戰爭衝突中的文化財產的損

失，提供了「特殊保護」。而這樣的保護，對以後各國戰爭時檔案管理的實踐影響深遠。

由於國際公約的缺陷，以及締約國之間對公約的解讀和理解的差異，部分國家內部也制定出符合自身國家利益的檔案管理規範，以應對戰爭衝突中可能出現的特殊情形。如前蘇聯的「焦土政策」，該政策規定：「當敵人進入或撤出某處時，盡可能的破壞任何可能對敵人有用的東西」。當時烏克蘭的檔案工作人員就被命令銷毀在納粹入侵之前無法撤離的檔案。儘管該政策並非為檔案的保護專門設立，且過於極端，但某種意義上保障了國家財產不受侵犯。然而，在後續的實踐中，這樣的政策被敵國濫用。在二戰德烏戰爭以及後來的美越戰爭期間，侵略國德國與美國均對被侵犯國使用了「焦土政策」，使得被侵犯國財產化為灰燼。此外，美國 SAA 也在其當時學會主席 Leland 的建議下，成立了專門委員會編寫了《國家緊急情況下的紀錄保管》報告，為敵對行動中檔案的保護和撤離提供了詳細的指導（Brooks, 1947）。

肆、國際戰爭衝突中的檔案管理實踐

經歷了一戰和二戰的洗禮，儘管世界各國遭受戰爭的創傷已逐漸淡化，但由於戰爭造成的國家檔案流失和歸還的問題依然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雖然聯合國、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以及國際檔案理事會就此議題已經形成了許多決議和建議，但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對有爭議的檔案索要和歸還問題達成一致的意見。根據聯合國統計，目前依然有約 83 個國家存在檔案爭議的問題。這些國家或已向當事國提出交涉，或不感興趣，或因害怕影響國家主權而選擇放棄（Leopold, 1998）。

二戰後，美國決定將繳獲的檔案歸還給德國時，曾明確表示，有一部分繳獲檔案的合法擁

有權應由美國政府持有，這些檔案會以「捐贈」的方式交給德國。部分檔案管理員透露，這些檔案主要因為沒有足夠的行政、法律研究或其他價值，且不能保證美國政府會進一步保存這些檔案，才進行轉讓。1975 年越南戰爭結束，美國軍方認為在越南共和國繳獲的敵方檔案在法律上屬於越南政府的財產，戰後僅保留微縮膠片副本。1983 年，美軍在格瑞那達（Grenada）的軍事行動中，查獲了當地的檔案文件，後被格瑞那達政府要求後歸還，但同樣保留了微縮膠片副本。1993 年，美國國防部主動同意將 1989 年在巴拿馬「正當防衛」行動中繳獲的檔案還給巴拿馬政府，而巴拿馬政府表示「不會尋求追回」。2006 年，SAA 與 ACA 聯合呼籲美國政府將檔案還給伊拉克國家檔案館，不僅包括美軍扣押的檔案，還包括庫德人（Kurd）在第一次海灣戰爭中扣押的檔案。而美國政府以當權者可能會濫用檔案迫害政治對手為由，一再推遲歸還，始終沒有確切日期。2009 年，一家韓國文化組織以歷史條約為依據，援引《歸還戰爭時期被掠奪文件的條款》，要求法國歸還 1866 年法國軍隊在韓國繳獲的 297 份皇室手稿，這些手稿被保存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後遭到法國國際法庭駁回了這一論點，並認為「儘管這些手稿來自韓國，但實際上已成為法國的國寶，它們現在構成法國政府不可剝奪的國家財產」（Cox, 2011）。

2012 年，國際檔案理事會對全球範圍內國家檔案管理機構做了問卷調查，統計結果如表 1（Leopold, 1998）。儘管收到的回復較少，但對回復問卷的統計中，不難發現國際檔案爭議的解決依然任重道遠。

伍、結語

自二戰後，國際局勢趨於穩定，但國際間的衝突並未停歇。儘管不同時期、不同國家，針對

表 1 國際戰爭衝突中的檔案爭議實踐（部分）

主權國	當事國	是否談判	爭議檔案	是否歸還
阿爾及利亞	法國	已談判	從 15 世紀到 1962 年間的檔案文件	部分歸還
安道爾	西班牙	未談判	公共與私人檔案	未歸還
中國	俄羅斯	未談判	1940-1971 年間中國共產黨生成的共產國際檔案的微縮膠片	部分歸還
中國	英國	談判中	公共檔案	未歸還
克羅地亞	奧地利	已談判	公共檔案的原件和微縮件	部分移交，後因前南斯拉夫分裂而終止
克羅地亞	義大利	已談判	與領土有關的公共和神職人員檔案的原件和微縮片	未歸還
愛沙尼亞	俄羅斯	談判中止	公共檔案	未歸還
德國	俄羅斯	1992 年起開始談判	二戰末期被蘇聯紅軍掠走的公共與私人檔案	部分歸還
德國	捷克共和國	1990 年起開始談判	公共和私人檔案的原件和複製件（主要是軍事機構的檔案）	部分歸還
德國	法國	1992 年起開始談判	軍事機構的檔案和 1925-1945 年間德國駐巴黎大使館的檔案	部分歸還
德國	波蘭	1970 年起開始談判	公共檔案，包括第三帝國其他中央部委的檔案	部分歸還和複製
印度	英國	1975 年起開始談判	1616 年至 1947 年期間東印度公司和印度辦公室的一整套微縮膠片	部分歸還
印度	法國	已談判	1690-1955 年間法國在印度行政機構檔案的全套微縮膠片	部分歸還
肯亞	英國	1970 到 1980 年間進行談判	在非殖民化進程中被從肯亞轉移到英國的檔案的微縮複製品	未歸還
拉脫維亞	俄羅斯	談判中	克格勃拉脫維亞地區處的檔案，戰俘集中營的檔案和一些攝製於 1920 至 1990 年間的電影	未歸還
立陶宛	俄羅斯	1920-1940 年	公共和私人檔案，例如耶穌教會的檔案，立陶宛大公國的法庭檔案，內戰期間的外交部檔案	部分歸還
蒙古	俄羅斯	談判中	國家繼承的原因向俄羅斯索要檔案	未歸還
荷蘭	俄羅斯	談判中	內戰時期國防部和私人團體檔案	未歸還
巴基斯坦	英國	1947 年起開始談判	1616-1850 年間東印度公司的檔案，1800-1947 年間的行政區檔案和與 1947 年與印度獨立有關的行政管理檔案。	部分歸還
俄羅斯	美國	1992-1995 年	斯摩棱斯克黨的部分檔案	拒絕歸還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

不同情況簽訂了處理檔案問題的一系列條約和國際公約，但在具體實踐過程中卻遭遇種種困難。這類問題不只是個專業問題，它更涉及政治利益和國家主權。而作為檔案工作者或檔案管理機構需要做的，就是防患於未然，積極制定完善的檔案保護及管理措施以應對未來無法預期的特殊狀況。無論一個國家的檔案在國際上地位重

要與否，但不可否定的是，它是屬於全世界的文化遺產，沒有任何現代國家能夠容忍大規模的對於歷史記憶的破壞和侵占。或許，各國採取保護檔案的措施和動機可能各有不同，但絕不容我們忽視。正如索倫·巴克所說的那樣：「全世界任何地方的檔案遺失都是全人類無法替代的悲劇」。

參考文獻

- 世界知識出版社編輯（1961）。《國際條約集》。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孫志偉（2018）。《武裝衝突中文化財產保護的國際法研究》。華東政法大學碩士論文，上海。
- 舒道（1992）。檔案在海灣戰爭中的作用。《檔案與建設》，5，56。
- 霍政欣（2016）。文化財產與武裝衝突 --1954 年《海牙公約》及其第一議定書。檢自 <https://www.icrc.org/zh/document/cultural-property-and-armed-conflict-hague-convention-1>
- 竇曉光（1999）。國際條約中處理檔案問題的基本原則。《中國檔案》，11，39-41。
- ACA, S. (2008). ACA/SAA Joint Statement on Iraqi Record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2.archivists.org/statements/acasaa-joint-statement-on-iraqi-records>
- Army, D. o. t. (2014). Counterinsurgency - FM 3-24: CreateSpace Independent Publishing Platform.
- Brooks, P. C. (1947). Archives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World War II, 1939-45. *The Library Quarterly*, 17(4), 263-280.
- Caswell, M. (2011). "Thank You Very Much, Now Give Them Back": Cultural Property and the Fight over the Iraqi Baath Party Records. *The American Archivist*, 74(1), 211-240.
- Cox, D. (2011). National archives and international conflicts: the 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 and war. *The American Archivist*, 74(2), 451-481.
- Eskander, S. (2004). The tale of Iraq's 'Cemetery of Books'. *Information Today*, 21(11), 9.
- Hmud, T. (2011). Iraqi Official Urges U.S. To Return Archive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ferl.org/a/iraqi_united_states_archives/24364123.html.
- ICA. (1995). THE VIEW OF THE ARCHIVAL COMMUNITY ON SETTLING DISPUTED ARCHIVAL CLAIMS. Paper presented at the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Guangzhou.
- Kahana, A. (2018). Lawmakers push Trump to keep Iraqi Jewish Archive in the U.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un-sentinel.com/florida-jewish-journal/fl-jj-american-lawmakers-trump-iraqi-jewish-archive-20180912-story.html>.
- Kami, A. (2010). Iraq asks U.S. to return millions of archive document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iraqi-usa-archives/iraqi-asks-u-s-to-return-millions-of-archive-documents-idUSTRE64I3J320100519>.
- Leopold, A. (1998). Disputed archival claims: analysis of an international survey: a RAMP study. Retrieved from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13472>

- McKemmish, S., & Upward, F. (1993). *Archival Documents: Providing Accountability Through Recordkeeping*: Ancora Press.
- NSDD. (1983). *Processing and Disposition of Documents acquired by U.S. Forces in Grenada*. Retrieved from <http://www.fas.org/irp/offdocs/nsdd/nsdd-112.htm>.
- OIF, O. I. F. (2006). *Intelligence Exploitation of Enemy Material*.
- Posner, E. (1944). Public Records under Military Occupation.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49(2), 213-227.
- SAA. (2003). *Statement on Iraqi Archives*. Retrieved from http://www.archivists.org/statements/iraqi_archives.asp.
- VERGUN, D. (2020). Senior DOD Official Describes Rationale for Attack on Quds Force Commander.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efense.gov/Explore/News/Article/Article/2050341/senior-dod-official-describes-rationale-for-attack-on-quds-force-commander/>.

附錄：

國際戰爭衝突中的檔案管理條約（部分）

條約名稱	簽署時間	涉及檔案歸還相關內容
《凡爾賽條約》	1919 年	第 38 條：德國政府應將移轉於比國主權下之領土內屬於民政、軍政、財政、司法或其各項之檔案、登記冊、地圖、證券及文件立即移交比國政府。德國政府亦應將戰爭期間內德國官員在比國公共行政機關攜去之各種檔案文件交還比國政府。
《聖日耳曼條約》	1919 年	第 191 條：奧地利應將侵佔地內所掠奪之一切紀錄、文件、古物與美術品及科學與目錄學之各種資料，凡屬於國家或省縣慈善宗教各公所或其他公私機關者，均應分別還於協約及參戰國。
《納伊條約》	1919 年	第 126 條：保加利亞保證毫不遲延地搜尋和返還在戰爭期間從希臘、羅馬尼亞和塞爾維亞 - 克羅地亞 - 斯洛文尼亞國的領土內劫去的具有考古、歷史或藝術價值的一切文件、檔案或一切物品。
《特里阿農條約》	1920 年	第 177 條：匈牙利應以公共機關所有之紀錄、文件、歷史資料，凡與割讓領土有直接關係而於 1868 年以後被攜去者，分別交還於有關係之協約各政府。
《里加和約》	1921 年	第 11 條第 5 款：俄羅斯和烏克蘭應將俄羅斯管理波蘭共和國領土期間內屬於立法機關以及一切部、軍隊、行政機關、自治團體和公私組織的中央、省級和地方機構的檔案、登記簿、檔案清單、契證、文件、地圖、圖案草圖等，凡與現在波蘭共和國的領土有關，並且事實上在俄羅斯和烏克蘭領土內者，一概返還波蘭。如在波蘭境內存在著對仍歸俄羅斯或烏克蘭的領土有特別利益的物件，波蘭應在同樣條件下將此項物件返還俄羅斯和烏克蘭。
《洛桑條約》	1923 年	第 139 條：有關土耳其政府的民政、司法或財政機關或土地管理當局的檔案、登記簿、圖、據和一切性質的其他文件應彼此予以移交。

條約名稱	簽署時間	涉及檔案歸還相關內容
《對義大利和約》	1947 年	<p>第 12 條：義大利應將 1918 年 11 月 4 日與 1924 年 3 月 2 日間，以義大利佔領的結果，從依據 1920 年 11 月 12 日簽訂於拉帕羅的條約及 1924 年 1 月 27 日簽訂於羅馬的條約，割讓於南斯拉夫的地區內移去的一切美術、歷史、科學、教育，或宗教性質的物品（包括一切契證，手稿，文件及圖書材料）連同行政檔案（卷宗，登記表冊，繪圖及各種文件）交還南斯拉夫。</p> <p>第 25 條：義大利同意取消從中國政府取得義大利天津租界所根據的租借權，並且同意該租界市政府的各種財產及檔案移交中國政府。</p> <p>第 37 條：義大利應將 1935 年 10 月 3 日以後，自埃塞俄比亞移往義大利的埃塞俄比亞及其國民的美術品、宗教或有歷史價值的物品以及檔案，在本條約生效後 18 個月內歸還。</p>
《對匈牙利和約》	1947 年	<p>第 11 條：匈牙利應將原屬於南斯拉夫或捷克斯洛伐克的完整的歷史檔案，人民所有的圖書、歷史文件、古物和其他文物，以及藝術家、作家或科學家所創作的藝術、文學和科學原作等予以歸還。</p>
《海牙公約》	1954 年	<p>第 4 條：締約各方應尊重在其自己領土內的以及在其他締約各方領土內的文化財產；不得採取針對文化財產的任何敵對行為，禁止對文化財產以任何形式實施的盜竊、搶劫或侵佔以及任何破壞行為；不得徵用在締約另一方領土內可以移動的文化財產；不得對文化財產實施任何報復行為。</p>
《巴黎公約》	1979 年	<p>承認各國政府有保護屬於本國的國家檔案的權利，禁止除原主權國主觀當局發出口許可證之外的文化財產運出本國領土，並強調主權國家要求索回或歸還流失的文化財產，是其正當的權益。若政權變更，凡繼承國和被繼承國任何一方要求複製對方的國家檔案，另一方應予提供，且費用由提出國負擔；凡國家檔案的繼承，引起被繼承國對檔案權利的消失和繼承國對檔案權利的產生，不應視為對保全國家檔案全宗的完整有任何問題。</p>
《維也納公約》	1983 年	<p>第 3 部分：凡有關領土或疆界擁有權的國家檔案，應轉屬於繼承國；凡涉及領土的正常行政管理的這部分國家檔案，應留在該領土內轉屬於新獨立的國家。</p>

資料來源：作者彙整